

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中国的源流与发展^{*}

贾根良

[摘要] 梁启超在 1902 年发表的《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标志着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中国诞生。本文运用经济思想编史学的方法,通过回顾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我国 120 年的发展历程,按照其在不同阶段的主要功能和特征,将其划分为五个阶段,考察了该学科在每一阶段发展的背景、动因和主要成就。在过去的 120 年中,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中国经济学发展和国家建设中发挥了三种主要的功能:引进新思想、为探求国家富强之道提供历史借鉴并提出新的战略思想、服务于国家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它也在“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但该学科在建构新的经济理论体系方面的功能基本上仍付之阙如,其在代表性高校的现状说明,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中国面临着生存危机,经济学界和相关部门对此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关键词] 外国经济思想史 学科建设 西方经济学 非正统经济学 经济思想编史学

[中图分类号] F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3) 05-0084-13

一、引言

考察某一学科的起源及其演变过程,不仅要对其源流进行描述,而且还需要在理论上对其进行评价,前者属于“史学史”的考察范围,后者属于“史学理论”的范畴。“史学史”需要对该学科的论文、教材和著作进行整理、汇编和分类,对其学科建制、理论论争及其与实践的关系进行考察,区分不同的学派,并对该学科的发展进行历史分期。我们既要对该学科不同理论或学派内在的理论逻辑进行研究,也要对影响这些理论或学派产生及其发展的学科外部因素(包括对不同理论或学派兴衰所产生重大影响的哲学和社会思潮、经济利益、阶级关系、学科建制及其权力结构等)进行考察。“史学理论”旨在于对学科发展史进行批判性的哲学反思,它包括对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纲领和研究方法的探讨,属于方法论层次的讨论,其目的就在于总结学科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探讨该学科发展的新方向。

与经济学家们对某一分支学科的发展源流进行探讨一样,经济思想史家对本学科历史及其研究方法的反思也包括“史学史”和“史学理论”两大部分,前者可以称之为经济思想史学史,后者称作经济思想史学理论。^①在经济思想史学科中,两者统称为“经济思想编史学”。但与经济学家们对某一学科思想史(包括经济思想和经济学家)的研究以及专业经济思想史家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不同,经济思想编史学是对经济思想史学科和经济思想史家本身的研究。如表 1 所示,它与经济思想史的关系,就像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学的关系一样。经济思想编史学关注的是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基础性概念和主题,如经济思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学理基础与政策研究”(21AZD0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贾根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100872)。

① 贾根良:《“新经济思想史”刍议》,《社会科学战线》2010 年第 1 期。

想史学理论讨论的是经济思想史学科的价值、功能、定位、方法论和经济思想编史的历史观等，并以此为经济思想史学史的研究提供理论指导。

表 1 经济思想编史学与经济学学科的三阶（三层次）体系^①

研究层次与学科类别	研究者	研究对象
经济学	经济学家	经济现象
经济思想史	经济思想史家	经济思想和经济学家
经济思想编史学	经济思想编史学家	经济思想史学科和经济思想史家

按照我国经济学学位点的设置，经济思想史学科属于理论经济学之下的一个二级学科，并下设三个三级学科：外国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和中国经济思想史。按照这种学科分工，外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外国非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历史，一般指欧美国家非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历史。本文系对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我国诞生和发展的编史学的初步研究，只是在必要时才谈及中国经济思想史和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的个别问题。

为了能够在比较的视野下更好考察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我国的诞生及其发展历程，笔者在这里有必要简要概述一下古德温对经济思想史学科在欧美国家发展过程的历史分期问题。古德温在给 2008 年出版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的“经济思想史”词条中，将该学科的历史演变划分为五个时期。在前四个时期，他将经济学家们研究经济思想史的不同目的或任务作为划分各时期的标准。在古德温看来，第一个时期是启蒙时期，研究经济思想史的目的是为了在理论和政策争论中将其作为辩论的手段，证明自己正确和对手的错误。第二个时期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研究经济思想史的目的是为了对各种学说进行梳理。为了改变当时经济学说的无政府状态，经济学家们转向经济思想史研究，目的是为了确定历史上哪些经济思想与他们看作正统的学说相一致，并挑选出能引导当时思想的经济学说。第三个时期是新古典经济学和历史经济学并存的时期，经济思想史在经济学研究中发挥着文献述评的作用。第四个时期被称作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的黄金时代，大约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持续到 20 世纪 50 年代末，经济思想史在经济研究中作为分析手段或启发法的手段来使用。第五个时期是从 20 世纪 60 年代至今，古德温称之为建立新的分支学科的时期，经济思想史研究作为启发法的手段为经济学发展的重大前沿问题提供答案的作用消失了。^②

对于我国来说，外国经济思想史的论著是随着西方经济学说传入中国的，而且晚于西方经济学说在中国开始传播的时间。在引进西方学者的经济思想史著作之前，梁启超 1902 年就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与欧美经济思想史发展的前三个阶段的任务不同，外国经济思想史在这个阶段（截至五四运动前）的主要功能是辅助西方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因此笔者将其称作“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诞生与初步引进阶段”。《新青年杂志》创刊后，西方各种思潮大量涌入中国，特别是在五四运动爆发后，欧美留学经济学者集中回国。为了给当时探索挽救民族危亡的道路提供借鉴，并受到经济思想史学科在美欧国家处于“黄金时代”的影响，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开始在中国得到迅速发展，形成了“繁荣和多元化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中国的发展与美欧国家分道扬镳，先后经历了服务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阶段（1950—1978）、引进西方经济学之桥梁的阶段（1979—1999）、编史学观念的突破和引进西方非正统经济学的阶段（2000—）。而美欧国家的经济思想史学科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开始步入衰落阶段，一直延续至今。目前，中国的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也步入了衰落阶段，但与欧美国家相比，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呈现许多不同的特征。本文将探讨该学科在中国发展的五个阶段，并总结其在过去 120 年发挥的重要作用，简要说明其面临的生存危机。

① 李黎力、贾根良：《经济思想编史学：学科性质、内容与意义》，《经济学动态》2017 年第 11 期。

② Craufurd D. Goodwin,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Steven N. Durlauf and Lawrence E. Blume (eds.),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Basingstoke, UK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p.48-57.

二、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诞生与初步引进的阶段

从1902年至五四运动前是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中国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和萌芽时期,该学科随着译介西方经济学著作而被引进到中国。中国学者从事外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并将之介绍到国内,主要有两个目的或任务:一是为了辅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外国经济学说,二是了解西方国家致富之路,以作为救国救民道路的镜鉴。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经济学说被介绍到中国。在甲午战争前,这种引进工作主要通过英美国家传教士的翻译作为媒介;甲午战争后,随着留日学生的激增,西方经济学说开始间接经由日文翻译介绍到中国;五四运动后,随着留美和留欧的大批学者陆续归国,西方经济学说引入到中国的途径又从日本直接转向了欧美国家,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1949年才结束。

在严复翻译并于1901年出版《原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之前,翻译到中国的西方经济学著作代表作是1880年出版的《富国策》,该书是由时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1827—1916)编译。在《富国策》中,作者介绍了属于经济思想史内容的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学说。正是因为这本书的编译,有学者甚至认为,丁韪良是向“中国介绍西方经济理论的第一人”。^①

对于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理解这些西方经济学说还是非常困难的。正如梁启超在《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指出的:“兹学译出之书,今只有《原富》一种(其在前一二无可观)。理深文奥,读者不易”。^②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引入和研究经济思想史就被人们看作是进一步学习和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必要工具。梁启超认为,如果严复能够“著叙论一卷,略述此学之沿革,斯密氏以前之流派若何,斯密氏以后之流派若何,斯密氏在此学中位置、功德若何,综其概而论之”,将会有利于读者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解。梁启超曾建议严复撰写一本简述经济学发展史的著作“以昭后学”,但严复没有时间从事这项工作。因此,当时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就使用三本日文经济学说史著作的材料,撰写了《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

1902年,梁启超从其主编的《新民丛报》第七号开始连续七回连载《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我国经济学家普遍将之看作是国人撰写的第一部外国经济思想史著作,本文也将梁启超的这本著作视作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中国诞生的标志。1901年发行的《译书汇编》第7期的“已译待刊书目录”一栏曾列有井上辰次郎的《经济学史》一书出版预告,^③但在目前的数据库里检索不到这本书的存在。并且,这本书虽然在一些书籍介绍里面曾经出现过,但没有被引用的译文,很有可能最后没有出版。与西方经济学学科在中国先传播后建立不同,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中国是先建立,然后才开始持续不断引进。1903年,由陈国镛翻译的日本学者田尻稻次郎所著的《二十年来生计剧变论》在中国出版。

在外国经济思想史的初步引进阶段,率羣使用日文有关经济学史、经济史和西洋哲学史资料撰写的两篇文章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第一篇文章题为《欧洲经济学思想变迁论》,自1912年第1卷第11期开始在《独立周报》连载,一直持续到1913年第2卷18/19期《独立周报》停刊,共约32页,该文只介绍了马尔萨斯及以前的西方经济学说(包括李嘉图经济学的部分内容)。《独立周报》停刊后,率羣在1914年的《雅言》杂志上发表了《世界最近经济学说变迁论》一文,该文介绍并评论了德国历史学派和奥地利学派。据推测,率羣似乎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法学家康宝忠的笔名,康宝忠早年曾在早稻田大学经济科学习,是《独立周报》的创始人。

在这个阶段,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具有两项功能。首先,作为推动西方经济学说在中国传播的有力工具,在引进新思想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次,为探索富强之道提供历史借鉴,并提供学理基础。梁启超曾将经济学视为决定“国之兴亡,种之有灭”的关键因素,因此寻找当时中国积贫积弱解决办法也是梁启超撰写《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的目的之一。率羣坦言,他撰写《欧洲经济学思想变迁论》和《世

①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页。

② 严复将economics(经济学)翻译成“计学”,但梁启超不同意他的译名,将经济学翻译成生计学。

③ 罗震宇:《清末民国时期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2020年。

界最近经济学说变迁论》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了解“欧洲经济学说变迁之大势”，以让国人能够“知欧洲能臻繁富之原因以及其学术之功用。”^①

这个阶段的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具有两个特征。首先，它深受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从梁启超撰写《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到五四运动，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几乎完全是经由日本引入中国。而德国历史学派在当时的日本是占支配性地位的经济学说，“在国家对倡导和保护工商企业扮演重要角色的社会，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不如德国历史学派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理论（在日本）具有吸引力是毫不奇怪的”。^②当时日本的经济学研究非常重视经济思想史（在日本被称作经济学史），流行的经济学说史著作也都是以历史学派观点撰写的。因此，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中国一诞生就被深深地打上了历史学派的烙印，而且这个特征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其次，外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在当时的高校中几乎没有讲授，学科建设仍未提上议事日程。北京大学于1913年在法科下添设“经济学门”，与商科并列，1916年“经济学门”在第二年开设有一学年的“经济学史”。^③但在当时的中国大学中，可能只有北京大学将经济思想史（经济学史）课程列为必修课，其他学校很少开设该课程。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外国经济思想史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19世纪初期和中期的一些著名政治家是美国学派的政治经济学的坚定支持者，林肯就是其中著名的代表。在当选总统后他全面推行了美国学派“关税保护、内部改善和国民银行”的经济发展战略，为美国在南北战争后的迅速崛起奠定了基础。作为美国学派的政治领导人，林肯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孙中山先生接受了林肯的“民有、民治和民享”的三民思想，该思想成为“三民主义”的直接来源。正如孙中山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演讲中指出的，“林肯所主张的这个民有、民治和民享主义，就是兄弟所主张的民族、民权和民生主义。”^④辛亥革命后，国外各种各样的思潮和学说开始被介绍到国内，马克思主义也开始在中国传播。

三、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繁荣和多元化发展的阶段

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急剧变革的时期，以《新青年》杂志为代表，国外各种各样的学说被大量介绍到国内，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学说。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先生备受鼓舞，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和演讲，热情讴歌十月革命。1919年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6卷第5、6号“马克思主义专号”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介绍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和《资本论》的主要内容，阐述了剩余价值理论，剖析了资本剥削的实质，阐明了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自此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原著被翻译成中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此同时，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中国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开始进入一个繁荣和多元化发展的阶段，一直到新中国成立，这个阶段才结束。

五四运动后，随着大量欧美留学生集中回国，经济学学科建制开始走上正轨，推动了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中国的迅速发展。“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相比，中国近代有关外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成果数量较多，促进该学科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是中国近代大学有关课程的开设。……中国早期经济学说史著作主要是作为教材之用的急就篇，其中译作超过半数以上，当时的西方经济学说史名著大部分都有译本”，^⑤“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其他经济分支学科中是罕见的”。^⑥其中包括三本著名经济学说史教科书的

① 罗震宇：《清末民国时期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2020年。

② [日]泰萨·莫里斯-铃木：《日本经济思想史》，厉江译，厉以平译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5页。

③ 孙家红：《通往经济民之路——北京大学经济学科发展史（1898—194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2页。

④ 孙中山：《三民主义之具体办法》，黄季陆主编：《总理全集》，成都：成都近芬书屋，1944年，演讲部分第11-12页，总第911-912页。

⑤ 邹进文：《民国时期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来自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3期。

⑥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471页。

翻译：一是夏尔·季德、夏尔·利斯特的《经济学说史》，^①该书在198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徐卓英、李炳焕和李履端的重译本；二是英国历史学派代表人物约翰·凯尔斯·英格拉姆（John Kells Ingram）的《政治经济学史》（中译本名为《经济学史》），^②上海社会科学院在2016年的《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丛书中出版了其影印本；三是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斯班的《经济学说史》教材，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斯班的这本教科书有两个译本，在当时的影响相当大。

但与“国内学术界热衷于翻译西方经济思想史著作，少有学术创新不同，中国近代海外留学生在外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进行了艰辛的开拓，有些学术成果得到当时西方学术界的推崇。”^③邹进文教授介绍了段茂澜的《作为经济学家的西斯蒙第》、赵迺抃的《理查·琼斯：一位早期英国的制度经济学家》和伍启元的博士论文《国际贸易价格关系理论：一个历史的研究》在海外出版和产生影响的情况。

在这一阶段，经济思想史译作的主要来源从日本转向了欧美国家，中国学者撰写的经济学说史教科书和介绍国外经济学名家的著作也大量出现，如唐庆增的《西洋五大经济学家》和刘秉麟撰写的关于斯密、李嘉图、李斯特等著名经济学家的系列传记和学说的著作。经济思想史学科在这一阶段得到高度重视，其中标志之一是1939年在当时教育部的建议下经济思想史在中国的大学中被设成了必修课。马寅初、赵迺抃、袁贤能、王亚南、陈岱孙、何廉和方显廷等为代表的留学生群体成为推动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中国发展的中坚力量，其中，袁贤能的《亚当·斯密前经济思想史》（1940）和赵迺抃的《欧美经济学史》（1949）代表着中国学者在这一阶段在外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上的最高水平。概括地说，这一阶段的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首先，这是一个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中国多元化发展的阶段。笔者在这里仅以斯班的《经济学说史》教材为例说明这个问题。斯班在这本流传甚广的教科书中明确地区分了经济学研究的两大传统：“人们已经不能再否认从亚当·米勒（德国历史学派先驱——引者注）一直到新的历史学派的经济学说都是由一条‘红带’贯穿着的。……这些人所产生的普遍的有机主义（Universalist-organic）和理想主义（Idealist）的学说，与亚当·斯密、李嘉图、萨伊、罗氏（Rau）、门格尔和杰文斯所主张之原子论的个人主义（Atomist-individualist）和物质主义的学说是可以相互辉映的……从历史的观点看来，不存在一种统一的经济学体系，并且依照个人主义和有机主义之资本的问题的变异，一切的思想必须类分为个人主义和有机主义的。”^④区克宣在其所译斯班《经济学说史》中介绍说，斯班是维也纳大学继庞巴维克之后的著名教授，他撰写的这本经济学说史教材初版于1911年，原书名为《经济学与重要派别》，每年销售一版，到1929年该书已重版过19版，并被译成多国文字。在这本著名的经济学说史教材中，斯班按照上述理论架构组织经济学说史的篇章结构，两种不同传统的经济学所占篇幅大致相当。在20世纪上半叶，西方国家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这种两大经济学研究传统的观念与欧美国家当时经济学的多元化是相互影响的，但在西方经济学于20世纪50年代发生“数学形式主义革命”以后，两种经济学研究传统的概念在西方国家就逐渐消失了。直到20世纪末，贾根良（1998，1999，2006）、泰伯（Tabb，1999）和赖纳特（Reinert，2004）才复兴了这个概念。

其次，经济学的历史学派对这个阶段的经济学和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影响最大。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国民体系》中译本（当时译名为《国家经济学》）于1929年出版，旧历史学派代表人物罗雪尔的《经济学历史方法论》和施穆勒（斯莫拉）的《重商制度及其历史意义》中译本同在1936年出版。192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刘秉麟撰写的《李士特经济学说与传记》，该书曾数次再版。1931年，朱谦之撰写并

① 当时的译者王建祖对这两位作者名字的翻译与目前不同，参见基特、理斯脱：《经济学说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23年。

② [英] 因格拉门（J. K. Ingram）：《经济学史》，李天纲、胡泽、许炳汉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

③ 邹进文：《民国时期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来自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3期。

④ [奥] 斯班（O. Spann）：《经济学说史》，区克宣译，上海：大东书局，1932年，第15页。

出版了《历史学派经济学》。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的中国,李斯特保护主义学说和德国历史学派得到了学者们较普遍重视。与现在不同,当时大部分学者都赞同保护主义学说和经济研究的历史方法。严鹏认为,德国历史学派对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民国经济学者主要关注这一学派诞生的渊源、保护主义政策以及历史主义方法,这些关注点基于中国学者将近代中国的处境比拟 19 世纪前期的德意志,而希望从德国历史学派那里寻求富强之道。在构建本土经济学的进程中,民国学者一方面视德国历史学派为榜样,另一方面又对其进行扬弃,为中国经济学的创立开辟了广阔空间。^①

最后,外国经济思想史对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里,笔者只简要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亚南、郭大力为了翻译好《资本论》在经济思想史上所下的功夫。他们认为,没有深厚坚实的理论修养和渊博的学识积累是翻译不好《资本论》的,这其中就包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源的古典经济学的深入理解。因此,在翻译《资本论》之前,他们花了 8 年的功夫先翻译出版了外国经济思想史上的名著:王亚南和郭大力合译了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和斯密的《国富论》,郭大力独自翻译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约翰·穆勒的《经济学原理》、杰文斯的《经济学原理》和伊利的《经济学大纲》。在此基础上,他们终于在 1938 年完成了 10 年前计划翻译出版《资本论》三大卷全译本的宏愿。时隔 10 年,郭大力翻译的《剩余价值学说史》也在 1948 年出版。

总而言之,这个阶段是我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的“黄金时代”,它承担着用经济学探索中国救国救民之道的使命。正是这种使命感造就了一个经济学发展的多元化阶段,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当然,在我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史上,这个“黄金时代”的形成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海外因素影响,当时欧美国家的经济学正处于多元化发展阶段,其经济思想史学科也正处于“黄金时代”。

四、服务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阶段

服务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是经济思想史学科在这个阶段(1950—1978)的主要功能,另一项功能是致力于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批判。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作用,当时教育部邀请苏联专家在新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授课,为全国高校培养政治经济学教员,构建起了以苏联教学经验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这一体系主要由政治经济学理论课程和经济学说史课程构成,从而建立起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经济思想史学科。

据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资料载,从 1950 年 6 月至 1957 年 6 月,曾先后有 7 位苏联专家在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工作。从 1952 年秋季开始,苏联专家为马列主义研究班特别是政治经济学分班授课,其中然明、卡拉达耶夫为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研究生班讲授经济学说史课程,并各自编写了《经济学说史讲义》。1957 年,该讲义由经济学说史教研室翻译出来,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卡拉达耶夫在教学过程中阐述了中国经济学说史的若干特点。例如,他提出中国经济学说比古希腊的家庭经济学产生得早,而且以解决国家经济问题为目的。在当时,我国高校经济学说史课程普遍采用然明撰写的《经济学说史讲义》作为教材。^② 为了提供经济思想史教学和研究的参考资料,我国经济学界在 1958—1960 年翻译出版了卢森贝的三卷本《政治经济学史》。这是经济思想史学科“苏联范式”的代表作,该阶段的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深受其影响。

1960 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编选大学文科教材的会议。根据会议决定,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的相关教师开始共同编写《经济学说史》教材,并由鲁友章、李宗正担任主编。该教材于 1965 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上册,但下册因故推迟到 1983 年 3 月才出版。它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由中国学者自己编写的经济学说史教科书,被参编者、我国著名的经济思想史专家季陶达教授称为“我国

^① 严鹏:《德国历史学派与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德国研究》2011 年第 2 期。

^② 吴起民、耿化敏:《苏联专家与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理论课程的建立(1949~1957 年)》,《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 年第 4 期。

第一部完整的经济学说史教科书”，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影响巨大，曾荣获国家教委评选的优秀教材一等奖，由吴易风、姚开建和贾根良修订的第三版（修订版）于 2013 年出版。

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开始，我国高校相继开设了两门课程，一门是外国经济学说史，另一门为“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介绍与批判）”。前者讲授的是凯恩斯及其之前的经济思想史，后者讲授的是凯恩斯之后的经济思想史，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包括前沿的经济学各流派），属于当代经济思想史的范畴。在这个阶段，这两门经济学说史课程的作用是配合当时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的教学与研究，帮助学生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配合当时的《资本论》教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62 年出版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说史教研室编写的《资本论典故注释》；为配合外国经济学说史的教学，商务印书馆分别于 1964 年和 1965 年出版了季陶达主编的《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选辑》和王亚南主编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后者后来又由吴斐丹教授主持修订并于 1979 年再版。

在 1950—1979 年期间，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主要从事两项工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诞生之前的经济思想史研究和名著翻译工作、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批判及其相关论著的翻译。以经济思想史学者为例，前者的代表作有 20 世纪 60 年代初出版的李宗正的《马尔萨斯主义》、鲁友章的《重商主义》、季陶达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重农主义》等专著，以及袁贤能翻译出版的托马斯·孟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和吴斐丹、张草纫选译并出版的《魁奈经济著作选集》等译作。后者的代表作有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阿尔弗里德·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重译本）、勒纳的《统制经济学》等许多译作。

五、引进西方经济学之桥梁的阶段

这个阶段（1979—1999）的突出标志是 1979 年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的成立。该学会最初的名字是“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它由陈岱孙、李宗正、朱绍文、吴斐丹、吴易风、蒋自强等 17 位主要从事外国经济思想史教学和研究的学者共同发起，是一个全国性的研究外国经济思想史和当代西方经济学说的学会。^① 该研究会所做的两项工作对西方经济学在中国传播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一是 1979 年 11 月至 1981 年春在北京大学开设国外经济学讲座，43 位学者共讲了 60 讲，这些讲稿汇编成四册，以《外国经济学讲座》为书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 1980—1981 年出版，在当时影响很大；二是组织业内专家从英文文献中挑选出外国经济学说和流派中具有代表性的著述，翻译、编辑和出版了 17 辑《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1979—1997），并通过定期举办学会年会以及主编论文集等形式，大力推动了经济思想史学科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推动了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此外，商务印书馆在这个阶段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为旗帜，系统地组织翻译和出版了一大批西方经济学名著（一部分是原有译本的再版或重译），其中有不少是外国经济思想史上的名著，如杨春学翻译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在这一时期，我国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经济学教育和研究中发挥的作用达到了顶峰。

1977 年恢复高考后，1979 年我国又恢复了研究生招生，随后恢复了学位授予制度。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1981 年 11 月 26 日下达的《首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及其学科、专业名单》和《首批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及其学科、专业名单》，被批准设有外国经济思想史专业首批硕士学科点的单位有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和辽宁大学，被批准设有外国经济思想史专业首批博士学科点的单位只有北京大学。1984 年，新增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和辽宁大学为外国经济思想史专业全国第二批博士学位授权点；新增上海财经学院（现为上海财经大学）为第二批外国经济思想史专业硕士点。1986 年，新增武汉大学为外国经济思想史专业全国第三批博士学位授权点；新增山东大学、华中工学院（现为华中科技大学）和云南大学为第二批外国经济思想史专业硕士点。

西方经济学专业尚未出现在 1990 年公布的第四批博士点授权单位中，但却出现在该年国务院学位

^① 《成立“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创议书》，《经济学动态》1979 年第 9 期。

委员会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由于根据新颁布的学科、专业目录申报新的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到批准有一段时间，因此直到1993年教育部才正式把西方经济学增设为新的硕士和博士点。^①在此之前，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生培养基本上是在外国经济思想史专业名义之下进行的。从表2可看出，外国经济思想史专业的博导不少也是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者，在引进西方经济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这个阶段，新编写了不少西方经济学说史或外国经济思想史教科书，代表性教材主要有陈岱孙主编的《政治经济学史》、陈孟熙主编的《经济学说史教程》、胡寄窗主编的《西方经济学说史》和汤在新、颜鹏飞主编的《近代经济学说史》等。在教科书的编写上，这一阶段也出现了明显不同于改革开放前的新思路。以陶大镛主编的《外国经济思想史新编》为例，^②在该教科书序言中，他批评指出，从新中国成立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经济学说史教材“大多侧重于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评述，基本框架和具体内容大同小异，在理论分析上不免显得有些刻板，未能鲜明地反映人类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全貌。”^③因此，该教科书增加了德国历史学派、边际革命以及属于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内容，并体现出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的编写理念。

在这个阶段，我国出版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外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专著。例如，陈岱孙于1981年出版了《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若干主要学说发展论略》；吴易风分别于1980年、1988年和1998年出版了《空想社会主义》《英国古典经济理论》和《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研究》；晏智杰分别于1987年、1996年和1998年出版了专著《经济学中的边际主义》《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一般说来，这个阶段的经济思想史专著大都是新中国第一代和第二代经济思想史学家撰写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基本上仍延续了上一个阶段的传统。

在这个阶段，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研究生教育的学科、专业目录中的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见表3）。自198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试行草案）》以来，研究生教育的学科专业目录先后颁布了1983年版、1990年版、1997年版、2011年版、2018年修订版和2022年版。直到1997年版，才在作为一级学科的经济学下设立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个二级学科，其中理论经济学之下6个专业的设置一直延续至今。从表3可以看出，1997年版的学科专业目录将外国经济思想史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思想史归并为“经济思想史”之下的子学科。因此，从1990年版的研究生

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专设西方经济学开始，再经1997年版将其归并为“历史类”，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逐渐与西方经济学分道扬镳，“这个转变意味着西方经济学已无须再通过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这个载体来发展。如同在国外一样，经济思想史不再被认为是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④受这个因素及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进入21世纪以来，外国经

表2 全国高校前三批（截至1986年）“外国经济思想史”专业博导名单

博士学位授予单位	指导教师
北京大学	陈岱孙
	厉以宁
	杜 度
	胡代光
中国人民大学	李宗正
	高鸿业
复旦大学	宋承先
辽宁大学	宋则行
武汉大学	谭崇台

表3 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中的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

1997年版《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的“理论经济学”各专业	1990年版《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的“理论经济学”各专业
020101 政治经济学	020101 政治经济学
020102 经济思想史	020102 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
020103 经济史	020103 中国经济思想史
020104 西方经济学	020104 外国经济思想史
020105 世界经济	020105 中国经济史
020106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020106 外国经济史
	020107 西方经济学
	020108 世界经济

① 方福前：《引进西方经济学40年》，《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12期。
 ② 陶大镛：《外国经济思想史新编》（上、下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1991年。
 ③ 陶大镛：《〈外国经济思想史新编〉序》，《经济学家》1989年第5期。
 ④ 李黎力：《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世纪流变》，《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8月11日。

济思想史学科在我国经济学界越来越被边缘化。

六、编史学观念的突破和引进西方非正统经济学的阶段

在过去的20年中,虽然经济思想史学科一直处于不断被边缘化的状态,但是受到新中国老一代经济学家重视经济思想史的影响,经济思想史学界通过对传统的经济思想史研究范式进行反思,取得了一些突破性成果,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繁荣时期。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出生的新一代经济思想史研究者,在引进新思想、发挥经济思想史研究引领经济理论创新的作用、提供富强之道借鉴和探索经济思想史研究新方法等方面作出了新贡献。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能简介该学科在这一阶段所取得的主要成果。

首先,突破了经济思想史学科传统的编史学观念。这主要表现在突破传统经济学说史的“前苏联范式”、打破“欧美中心主义”的编史学理念、倡导主流和正统并重的多元主义编史学新理念、提出学科建设的“新经济思想史”研究纲领,并有以下四项代表性的成就。

一是蒋自强等浙江大学6位教授的四卷本《经济思想通史》在2003年出版,共230多万字。该书有三大主要贡献:将中国与欧美经济思想从古至今纳入到一个统一框架进行分析,突破了“欧美中心主义”的经济思想编史学理念;突破了以卢森贝为代表的以阶级斗争作为经济思想编史学单一模式的“苏联范式”;尝试性地运用经济思想的“供求”模式揭示经济思想演化发展的机制。

二是顾海良和颜鹏飞主编的《新编经济思想史》(共11卷)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在2016年出版。该书贯通中国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和西方经济思想史,目的是突破经济思想编史学的“美欧中心主义情结”,表现出了鲜明的中国情结,“从中国出发、以中国结尾”是这套巨著的突出特点。

三是贾根良和张林倡导主流和正统并重的多元主义编史学理念,并将之付诸实践。贾根良指出,“经济学家们可以大致上被分为两种类型……熟悉经济学说发展史的人都知道,长期以来,这两类经济学家构成了经济学研究的两大传统,”^①这就是西方正统与非正统经济学的两大传统。张林在其编写的经济思想史教科书中贯彻了多元主义编史学的理念:“目前多数经济思想史教科书其实更多地是‘西方正统经济思想史’,对正统经济学的反对派着墨不多。本书对正统与非正统经济学同等对待:从第二篇开始,在每一个时间段都反映出两种经济学的发展。”^②

四是贾根良在多篇论文中扼要阐述了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纲领:西方经济思想史中存在着经济学研究和经济政策制定的两大传统和三大理论体系,“新经济思想史”应该以此为框架重新梳理西方经济思想史的演化过程,并以现代宇宙观为标准对各种经济学说重新进行评价;“新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目的是经世致用;重点研究发达国家历史上脱贫致富的经济思想史;创建介于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学科之间交叉研究的“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子学科;系统地发展史论结合的经济思想史理论;以“创造解释学”为基础,发展“新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③

其次,对经济思想史学科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和研究目的有了新的认识。贾根良认为,作为经济学的一门基础性学科,经济思想史本身就是经济学,它可以通过发挥理论和政策的批判性功能,启迪、推动和直接从事经济理论的创新,并为解决实际经济问题提供政策建议。同时,作为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创新的基因库,经济思想史具有经济学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许多重要功能。例如,更好地理解经济理论的创造过程,更好地把握现代经济理论,更好地体悟经济政策因时因地制宜的至关重要性,培养经济学多元主义科学思维,避免理论和政策主张的极端主义,作为思想基因库保留被排斥的经济思想,温故知新,为新理论的创造提供建筑材料,立足于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规律对前沿理论创新和经济学发展的方向进

① 贾根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西方主流化遭遇重大质疑》,《南开经济研究》2003年第2期。

② 张林:《经济思想史》,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6页。

③ 贾根良:《“新经济思想史”刍议》,《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期。

行评价,等等。^①

就经济思想史在经济理论创新中的作用而言,贾根良、姚开建提出,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目的就在于解放思想,营造经济学多元主义的学术氛围,为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铺平道路,为经济理论创新的成败提供历史上可以借鉴的经验和教训,为经济思想史中曾存在但在目前经济学发展中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或被忽视的重要理论问题提供新思路 and 灵感来源,为解决中国重大经济问题所提出的特殊而又具体的原创性理论命题提供支援意识。^②张林讨论了经济思想史研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中的重要作用。^③在经济理论创新为我国经济学发展提供借鉴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方面,关永强、张东刚的论文^④和张林的专著^⑤具有代表性。

再次,为我国强国富民之路提供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的借鉴研究。为了适应中国崛起而借鉴历史经验的需要,在过去的20年中,有相当多的经济思想史研究者对推动发达国家崛起的经济思想史进行了深入研究,具体包括我国台湾清华大学荣誉退休教授赖建诚的《亚当·斯密与严复:〈国富论〉与中国》(2022年出版了英文版),贾根良的团队对重商主义、李斯特经济学、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系统和深入研究,梅俊杰对李斯特经济学思想史的系统研究,杨春学、魏建和严鹏等对德国历史学派的研究,徐则荣、黄阳华等对熊彼特经济学思想史的研究,张林、贾根良等对老制度学派思想史的研究,杨虎涛、贾根良等对演化经济学思想史的研究,贾根良、马国旺、张凤林和李黎力等对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思想史的研究,以及梅俊杰、李新宽、伍山林、黄阳华和唐万宁等对重商主义经济学的研究。2015年,贾根良、梅俊杰主编的《经济史与国富策译丛》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梅俊杰在2013—2018年还主持翻译出版了科尔贝、汉密尔顿和维特等经济战略家的传记。

最后,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成为引进西方非正统经济学的主要途径。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自20世纪90年代末与西方经济学分道扬镳后,就转变成了引进西方非正统经济学的主要途径。例如,演化经济学、老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新发展、新熊彼特经济学、奥地利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新发展、女性主义经济学、演化发展经济学、明斯基经济理论和“现代货币理论”等西方非正统经济学基本上都是由外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引入到中国的,他们还在引进法国调节学派和复杂系统经济理论等方面也作出了贡献。引进西方非正统经济学与2008年开始召开的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有很大关系,该年会的骨干成员大部分也都在从事经济思想史研究,目前国内已出版了三套具有代表性的西方非正统经济学译丛:贾根良主编的《演化经济学译丛》(2004—2007)、孟捷主编的《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译丛》(2007)和张林主编的《西方非正统经济学译丛》(2008—2013)。

外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注重引进西方非正统经济学的原因:一方面,西方非正统经济学虽然在西方国家目前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但却有先进的宇宙观和现实主义的研究方法,代表着西方经济理论的未来,可以与中国文化传统共同构成中国经济学原创性发展的支援意识;^⑥另一方面,相比西方正统经济学,西方非正统经济学给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规律的研究提供了更现实和更深刻的描述和分析,因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具有直接和重要的借鉴价值。^⑦引进西方非正统经济学,在中国形成经济学多元发展的局面,将会促进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学派的形成,有助于实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体的长远目标。^⑧

① 贾根良:《“新经济思想史与新李斯特学派丛书”总序》,贾根良等:《新李斯特经济学在中国》,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② 贾根良、姚开建:《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与“新经济思想史”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2期。

③ 张林:《经济思想史研究在构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作用》,《光明日报》2019年6月18日。

④ 关永强、张东刚:《英国经济学的演变与经济史学的形成(1870—1940)》,《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⑤ 张林:《从多元到新古典霸权:20世纪上半叶经济学在美国的发展及其影响》,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

⑥ 贾根良:《西方异端经济学传统与中国经济学的激烈转向》,《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3期。

⑦ 贾根良:《我国应该加强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年第1期。

⑧ 张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非正统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的多元发展》,《社会科学辑刊》2016年第4期。

在这一阶段,我国经济思想史学界在出版相关刊物、召开专业会议、成立经济史学系等学科建设方面取得了新进展。首先,创办专业期刊。顾海良、颜鹏飞于2006年创办《经济思想史评论》辑刊;王立胜、周绍东于2019年创办《经济思想史研究》辑刊;2021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创办《经济思想史学刊》(季刊)。其次,召开专业学术会议。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多次经济学“两史学科”(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学术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于2019年12月召开全国性的“第一届经济思想史前沿论坛”。再次,成立专业化的教学和研究机构。中央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和北京大学成立了专门从事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教学与研究的经济史学系。最后,通过其它形式推动经济思想史教学和研究。例如,截至2022年,北京大学已举办6届“中外经济思想史研究”暑期讲习班;中国人民大学的经济思想史学科举办经济思想史读书会(截至2022年底已举办40期),以及通过“RUC经济思想史”公众号向学界和社会推送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成果。

在这一阶段,外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者还将欧美国家经济思想史学界在过去40年有关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基础理论及前沿成果介绍到国内。例如,张林引入了经济思想史的事件研究方法,并创造性将其运用到对学科评估等方面的研究。进入新世纪以来,西方经济思想史学界对辉格史观在战后经济思想史学科中的支配性影响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其标志性成果是《剑桥经济学杂志》在2014年第3期出版的一整期专刊由乔洪武和贾根良等介绍到了国内。贾根良、何增平将经济思想史的两大权威名著——米切爾的《经济理论的类型:从重商主义到制度主义》和卡尔·普利布拉姆的《经济推理史》介绍到国内。贾根良、李黎力和兰无双还将经济思想史学、经济学史、经济政策史与经济政策思想史等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分支学科介绍到国内。所有这些都拓宽了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范围,对中国经济思想史和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的学科建设和研究工作也是有益的。

在这一阶段的外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上,有不少学者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韦森对外国经济思想史的诸多领域具有广泛兴趣,其对哈耶克经济思想的研究在国内广为人知;张旭昆是外国经济思想史的资深研究者,其专著《思想市场论——分析知识产品演化的一个模式:以经济学为例》是经济思想史理论的代表作;罗卫东是经济思想史跨学科研究的代表性人物,出版了专著《情感、秩序、美德:亚当·斯密的伦理学世界》;马涛的《经济学范式的演变》力图揭示经济学范式与经济思想史发展内在逻辑的规律性,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姚开建著有《广义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生产方式》;乔洪武等著的《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获得2019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杜丽群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外国经济思想史”分支条目的主要撰稿人,2009年获中央宣传部和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编纂出版重要贡献奖;李井奎是凯恩斯经济思想史研究专家,翻译的《凯恩斯文集》(11卷)正在陆续出版;梁捷撰写了不少经济思想史随笔和小品文,在普及外国经济思想史上作出了贡献。

七、结语:学科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值得高度重视

通过对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中国发展历程的简要考察,我们可以观察到,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我国经济学的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笔者在这里将其简要地总结为三种主要的功能。

首先,引进新思想的桥梁。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过去120年中一直发挥着引进新思想的作用。虽然绝大多数人将经济思想史看作是历史的学科,但经济思想史学科也是一门前卫的学科,因为经济思想史家只有通过研究经济学说的前沿来回顾它的历史,才能对历史上的各种学说进行评价。同时,该学科也通过研究过去的学说来观察和评价新思想的诞生、发展和未来演变的趋势,这是该学科非常重要的功能。凯恩斯曾说,“研究思想的历史是解放思想的必要前提”。20世纪初的著名科学家彭加勒又说,“为了预见数学的未来,正确的方法是研究它的历史和现状”。两位学者讲的就是思想史的这个功能。

其次,为探求国家富强之道提供历史借鉴,为制定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解决重大现实经济问题提供灵感或新思路。笔者在这里举两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第一个例子:晚清和民国时期的中国最需要借鉴

的外国经济学说是李斯特的保护主义学说，而严复却翻译了斯密的《国富论》。梁启超认为斯密的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理论不适合中国国情，提倡中国采取德国式的保护主义和英国历史上的重商主义，这无疑与他对西方经济思想史的了解有很大关系。五四运动之后的民国经济学家绝大多数都赞同李斯特的学说，不再盲从西方经济学说，这也与外国经济思想史的作用有关。第二个例子：笔者提出“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思想史研究存在着交互作用的关系，“笔者组织翻译赫德森的这本著作就是为了呼唤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大变革准备思想材料，并为笔者提出的‘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提供历史经验的借鉴。”^①

最后，服务于国家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建构。社会科学国家知识体系的建设是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虽然存在着不足，但在新中国成立后 30 年服务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是无可厚非的。2022 年 4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在其中，外国经济思想史和西方非正统经济学学科作为比较、借鉴和激发灵感的途径将发挥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 30 年，外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集中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诞生之前的政治经济学史，割断了与此后发达国家政治经济学新发展的联系，使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失去了从中获得启迪和吸收营养的机会，这是一个值得记取的教训。发达国家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的新发展就是西方非正统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无关。但改革开放后，我国引进西方经济学言必称西方主流经济学，只有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注重引进西方非正统经济学，这使得政治经济学学科从后者获得启发和借鉴的机会受到了限制。在当代西方非正统经济学的发展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非正统经济学日益融合，西方非正统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自主创新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我国经济学界亟需改变对西方非正统经济学的态度。

在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经济思想史学科在我国还有一个缺失的重要功能，这就是通过经济思想史研究建构新的经济理论体系。任何一种新学说，都可以在思想史中找到其先驱。经济思想史是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创新的基因库，只有在适当的时机、环境条件下，某些基因经过“组合”，才能创造出新的理论学说和新的理论体系。例如，“现代货币理论”基本上就是在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基础之上搭建的宏观经济学新框架，其基础内容绝大部分来自于经济思想史中已有的学说，包括 100 年前就已经消失的德国新历史学派克纳普的国家货币理论，勒纳在 1941 年提出的功能财政理论，美国老制度主义的制度分析，以及马克思、凯恩斯和卡莱茨基的有效需求理论和资本主义生产的货币理论，等等。经济思想史中的这些理论元素一直在等待历史机遇，直到 1971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为其赋予新的使命。当然，“现代货币理论”也有重要的创新，它是一个新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虽然在过去 20 年的繁荣期，我国的一些学者对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作出了某些贡献，但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这个功能在我国基本上还是付之阙如的。

笔者在前面已经提到，经济思想史学科自在学科建制上与西方经济学分道扬镳后，就一直处于不断被边缘化的地位。因此，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我国过去 20 年的繁荣期有可能将成为历史，因为这种繁荣只是表现在少数坚持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学者的研究成果方面，而学科本身的生存正面临着危机。笔者在前面列出了改革开放后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前三批获得博士点授权的 5 所高校和教授名录。查阅这些高校官网上的研究生招生目录，笔者发现，除了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各有一位临近退休的教师仍在招收经济思想史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和辽宁大学先后在 2022 年和 2023 年都已停止招生。导致这种状况的一个原因是该学科长期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以武汉大学为例，该校的外国经济思想史专业在其鼎盛时期有 5 位博士生导师，但在这些教授退休后，这个学科在该校基本上就消亡

^① [美] 迈克尔·赫德森：《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贾根良、马学亮等校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译者前言第 16 页。

了。^①虽然中央财经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都设有经济史学系，但这些学系基本上都是以经济史和中国经济思想史为主，只有伍山林教授一人兼职指导外国经济思想史博士研究生。这说明，在经济学繁荣发展的背景之下，外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建制在中国正面临着生存危机。

笔者在以往的论著中曾对造成我国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边缘化的原因进行过讨论，这里不再赘述。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生存危机是一种全球性的现象。由于该学科在经济学院生存困难，西方经济思想史学界对该学科是否应搬到历史学系和科学史学系已经展开了长达 30 年的争论。^②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西方主流经济学通过顶级期刊、学科评估排挤和打击经济思想史学科是导致该学科衰落的主要原因；在我国，经济学数学形式主义的支配性影响和学科评估是导致该学科日渐衰落的重要原因。我国经济学界和相关部门应该正视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衰落对经济学生态系统造成的严重损害：正如生物多样性是生物进化的基础一样，作为多元化思想基因库的经济思想史学科发挥着类似的作用。一旦一个学科不再了解自己的历史，其发展将面临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境地；一旦一个学科缺乏多元主义科学精神，教条主义就会盛行，创新就会受到巨大阻碍。一叶知秋，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衰落的问题不是该学科本身的问题，其背后隐藏着许多重大的深层次问题。我国经济学界和相关部门应该对此引起高度重视，以“将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为宗旨改革中国经济学教育和科研体制。只有这样，才能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营造一个多元化的学术环境。

责任编辑：张 超

① 朱亚男：《我国高校外国经济思想史专业研究生学位论文评述》，武汉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2019 年。

② 贾根良、兰无双：《关于经济思想史学科专业归属和栖息地的争论》，《经济学动态》2016 年第 12 期。

（上接第 83 页）

对科研活动的不当干预的监督职责。最后，健全依托单位怠于履行相关职责的责任承担机制。为实现由碎片化权力下放向整体性职权观转变，科研资助机关要加强对依托单位履行相关职责尤其是科研服务职责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对于不积极履职的要纳入依托单位信用记录，并根据信誉评价结果采取分类分级处理，建立差别化管理模式。^①同时，通过完善依托单位准入与退出机制，对依托单位形成制度压力，迫使其依法履职。

四、结语

依托单位的制度建构需突破行政管制的传统思维惯性，以契约精神阐释依托单位与资助机关、科研人员间的法律关系。科研资助机关权力下放的同时要为依托单位履职提供必要制度支撑，并以依托单位与课题组负责人间的合同关系为基础，分级落实科研管理职责。依托单位职责建构应在遵循中立性、专业性、主动性等基础上，建构以协调科研监管与科研自由为基础，贯穿于立项、实施、结项全流程的负责体系。深化科研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是一项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合作的系统性工程，需将依托单位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的提升放置于国家现代化的框架之下，以依托单位改革为突破口，明确其在科研管理体系中的法律地位，并以科研项目合同为基础优化其权利配置，实现科研管理体制由行政化向市场化再到法治化的转变。

责任编辑：王 冰

① 贾雷坡、张丽萍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依托单位 2000—2019 年发展情况分析——对加强依托单位管理的探讨》，《中国科学基金》2021 年第 4 期。



贾根良

贾根良，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5年作为引进人才从南开大学调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目前为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西方经济学流派评析》编写组专家。2022年北京市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曾任中国演化经济学会年会主席，现任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并在国内多家大学任兼职教授。

贾根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经济思想史、演化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科技政策、经济史、财政金融与宏观经济学等。已出版独立著作6部，主编和作为第一作者合著12部专著和教材，主译学术专著8部，主编和合作主编5套丛书。在《中国社会科学》等杂志发表

表论文近300篇，其中不少论文被《新华文摘》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全文转载。

贾根良教授最早将演化经济学引进国内，对包括现代货币理论在内的西方非正统经济学各流派和批判实在论社会科学哲学都有深入研究。作为“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中国代表人物，21世纪初他就倡导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提出“新经济思想史”和中国新李斯特经济学的研究纲领。自2009年以来，倡导中国经济发展新战略，包括：保护民族产业、主权信贷、内需主导、智能工业化、国家作为创新的发动机和不对称全球化。贾根良教授在2010年提出的“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和“中美经济脱钩”概念在2016年之后成为流行术语。2011年，他在《解决中国外汇储备贬值的大战略》一文中提出：“以中国为龙头，团结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一种与美元体系相平行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他2020年出版的《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新战略与政策选择》一书重印了8次。贾根良教授在2023年初提出，2014年以来中国经济不断下行的原因在于中国投资的供给效应远超吸收其产出的需求效应，特别是中国国内有效需求严重不足。为了使中国经济重归“中高速增长”的轨道，实施“人民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势在必行：中央财政在今后10年左右将需要前所未有的高赤字率，通过财政开支持续大幅度地增加劳动者收入，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以解决产品市场的最终需求问题。这是中国步入“国内大循环”良性循环的必由之路。